

“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媛媛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7月27—28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和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协办的“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的战时经历与体验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一、战时国统区社会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日趋青睐,国统区社会群体研究随之兴起。本次会议上,此类论文达12篇,囊括多类社会群体。在蒋介石研究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刘维开的《蒋介石日记中的八年抗战》一文,通过考察蒋日记中关于战事发展的相关记载,阶段性地描绘出蒋在抗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陈红民的《抗日战争对蒋介石个人的影响》一文,探究了抗战经验对蒋人生所产生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的《蒋介石与华南抗战》一文,则着力探究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军事、人事部署及其矛盾。这三篇论文均以蒋介石日记为依据,为理解蒋在抗战中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助力。

在人口迁移、大后方知识人生活体验和难童救助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齐春风、严海建和吴媛媛分别展开论述。齐春风的《战时人口迁移的特点与影响》一文大量引用“迁移者”的日记、回忆录、传记等材料,在再现战时中国人口迁移路线的同时又兼顾“迁移者”内心感受,从细微处刻画出战时人口迁移的精神世界。严海建的《战时生活体验与大后方知识人的转变》一文,在充分运用“知识人既有记录”的基础上,挖掘出隐含于这些“记录”中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吴媛媛的《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及其工作概述》一文,以联合委员会为焦点考察了抗战末期在国民政府社会部领导下所展开的救助难童活动,对澄清有关联合委员会的历史事实,以及描绘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概貌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关于战时的社会抗议运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的《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倒孔运动”》一文,利用各种日记、档案和报刊资料,详尽还原了大后方历次“倒孔运动”的来龙去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的《“骂战”:近代中国对日怒称之一》一文,以《申报》为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法追寻了自1872—1949年该报所载“倭寇”一词的使用规律,并揭示出隐含于这一使

用规律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

此外,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的《“防共”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一文,以“防共”问题为线索,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展开分析,提升了苏联在抗战决策过程中的催化作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的《论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文,通过论证南京保卫战的象征意义、战略承接作用,以及守城官兵的抗战精神,提升了其在抗战战役中的历史地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沛霖的《电信事业与战时军事》一文分别从战时军事与电信组织、电信建设、电信收支等三个观点着力,集中探讨抗战时期电信事业与军事需要之间的交互发展状况。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芹的《民国时期清遗民的日本观分析》一文,则站在“清遗民”这个特殊群体角度,探讨了抗战期间该群体在政治认同、行为、立场与心态等方面的变化,以彰显他们在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痛苦抉择。

二、战时沦陷区社会研究

民族主义在沦陷区的影响力与表现形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次会议围绕该主题的研究论文多达13篇,是中、日、韩学者关注的重点。以租界经济为议题,日本群馬大学教育学部金井就稔在《中日战争前期中日两国对上海租界政策》一文中,通过考察战时中日两国的租界经济政策,认为两者都面临着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主义的矛盾。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福运的《“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文,考证了“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从淞沪会战时期的劳资冲突骤减、劳资合作局面出现,到1939年劳资收益严重失衡而再次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的整体过程,揭示出汪伪、国共地下力量,以及英美势力较量下租界工潮的基本规律。

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金丸裕一的《战时日本技术专家视野下的中国电力产业》一文,从日方文献和视野出发,以1938年日本中支电业组合调查团的《中支电气事业调查报告书》为蓝本,分析了抗战初期日本电力专业技术人员眼中上海及江浙地区的电力情况,以及由《中支电气事业调查报告书》缺陷而导致的“后来日军在中国战场鲁莽行事”结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和夏军的《日伪统治下的浙江教育》一文,则从教育宗旨、教育目的、所设学校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对日伪在浙江的教育政策进行全面考察,认为浙江沦陷区的教育是日伪妄图铲除抗日思想,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的工具,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各省实施奴化教育的缩影。

近年来,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本次会议中有三篇论文对这一主题又有新的解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卫星的《日本外交官对日军南京暴行的反应与应对》一文,揭露日本外交官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既想避免引起外交纠纷又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偏狭举措。日本学术振兴会松谷晔介的《安村三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唯一的日本成员》一文对安村三郎的在华活动经历展开研究,证实安村三郎在华工作时身兼“日军的内线”与“和平工作者”双重身份。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经盛鸿的《不屈的南京民众》一文则引据大量史实,证明南京市民在日伪统治期间有绝大多数人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仍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斗争。

战时中日社会除在经济、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博弈外,还涉及不少社会组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苏智良与王海鸥的《南市难民区的相关问题再探讨》一文,围绕南市难民区的建立时机、收容人数,及饶家驹与汉口难民区等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或被忽视的问题提出了最新考证见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平和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高鹏程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一文中,考察了沦陷区红卍字会在各方政治力量夹缝中继续活动的历史,指出其在事实上难以超脱于民

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之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洁的《抗战初期华东沦陷区的社会群体——关于“大民会”的考察》一文,则通过对大民会进行考察,认为主要从事宣传中日亲善思想及社会救济事业的大民会,在事实上却难以获得该会会员、职员及被救济难民的拥护。

此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淑娟的《日本移民侵略的先锋——满铁铁路自警村探析》通过对满铁铁路自警村的历史渊源、特征、经营实态等展开论述,揭示其所肩负的“大陆开发”先锋使命。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贵福通过《实际困难、思想局限与路线斗争——中共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的原因》一文,探析了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战初期争取东北义勇军领导权失败的多重原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范国平的《抗战时期吴佩孚与汪精卫的秘密交涉函电析论》一文,以吴、汪之间的往来函电为依据,详细分析了“吴佩孚工作”中双方交涉的具体过程。

三、中共根据地社会研究

中共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与敌伪开展“解放”与“囚笼”拉锯战的地方,对当地民众生活影响极大。以妇女解放为视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和王微的《“三寸金莲”之变:战时华北中共区域女性身体与政治》一文,通过对比战争前后妇女缠足景况,指出华北妇女的缠足习性是在战时残酷的生死教训下才基本改观的,因之抗战既具有救亡意义,也具有启蒙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吴云峰也以根据地妇女为研究对象,其《革命、权利与习俗:华中根据地妇女的家庭地位考察》一文,将妇女置于革命、权力与习俗所营造的张力中,动态地观察华中根据地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

对于日军的“囚笼”政策,韩国国立韩京大学尹辉铎《抗战时期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民众生活的影响》一文,将焦点置于晋察冀边区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辩证地论述介于日军、边区民众和中共之间的博弈,认为正是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最终决定了华北民众选择参与抗日并接受中共领导。

同时,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岳谦厚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货”贸易》一文,运用山西省档案馆的档案,论证了晋西北根据地“特货”的基本史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元康在《抗战时期安徽并不存在完全沦陷县份》一文中,通过对1945年8月安徽省政府秘书处汇编的《安徽省战时损失概况》重新考订,逐一推翻该书认定安徽省有15个县全部沦陷的判断。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王选和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常晓龙的《战时华北农村灾情——1943年卫河沿岸地区霍乱等战争灾害调查》一文,介绍了自2006年以来开展社会调查的经过、区域、内容、发现、结果等目前民间战灾调查工作情况。

四、战时社会的特殊面相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在开幕致辞时强调,抗日战争不仅在中国本土进行而且延及海外,因此我们在关注国内抗战的同时应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海外。若干特殊社会群体引起本次与会学者关注,相关论文共计六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其在抗战中的面相。

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归属问题,学界一般将之归咎于日本政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桂芳在《日本国内支持战争狂热的表现及成因分析》一文却指出,日本政府虽然对战争负有最根本的责任,但中日战争持续14年之久,与日本国民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日本人既是战争受

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客观分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国民原因。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平和研究所石田隆至的《战争末期被掳中国战俘奴工与其社会影响——以秋田县花冈矿山为例》和张宏波的《战争末期被强掳中国战俘奴工与其对社会的影响——以日本神奈川县相模湖水库建设为例》，分别以秋田县花冈矿山和神奈川县相模湖水库为例，介绍了上述两地强掳并虐待中国战俘的口述调查经过与结果，提出与史桂芳教授有相似的观点，即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将日本战争的指挥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民众“作为对立项的战争观”。

同时，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通过《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城市的轰炸（1937.8.14—1941.9.15）》一文，考证日本海军航空队从密谋发动“大山事件”而挑起上海战端开始，进而强行对南京、杭州、重庆等中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使中国空军和平民遭受重大打击。在对 中国进行轮番轰炸以作为对美作战训练的同时，日本海军航空队还蓄意挑衅英美，先后通过“帕奈号事件”“海南岛事件”“南洋行动”及珍珠港事件逐步将其拉入战争而走上太平洋战争之路。笠原以日本海军航空队这一特殊群体为对象，论证了其在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场应负战争首责的问题。

抗战期间的华侨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的《抗战初期新西兰华侨的捐款风波》一文，利用“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图书馆所藏华文报纸《中国大事周刊》，实证研究了抗战初期新西兰华侨在捐款救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纠纷。提出新西兰虽然“国小人少”，但抗战期间当地华侨的捐款数额“可以与被认为人均捐款最多的美国华侨相提并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展的《非常时期的朝鲜华侨社会生态——朝鲜侨案中的华侨、警察、汪伪领馆》一文，在利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驻日大使馆档案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的基础上，围绕朝鲜侨案，考察了华侨、朝鲜当局及汪伪驻朝领事馆三方的利益博弈关系。

综而观之，此次会议论题涉及战时难民、妇女、华侨、战俘、知识分子、儿童、遗民、专家及社会组织等，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张连红所言，当前抗战史研究已进入到一个多元时代，在学术讨论和批评的推动下，它必将继续迎来研究热潮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诚如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宪文在开、闭幕时一再强调的，抗战胜利已经 70 周年了，我们在纪念它的同时还应该思考 70 年以后走向何方的问题。不管抗战研究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实证研究和讲求科学这三个基本原则。

〔作者吴媛媛，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博士后〕

（责任编辑：郭 蕾）